

典籍翻译研究

敦煌变文英译补缺现象研究

颜方明 秦倩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敦煌变文作为中国俗文学的重要源头,具备不可替代的文学与文化价值。以敦煌变文英译过程中的翻译补缺现象为核心研究对象,展开系统性探讨。首先,基于变文的文本特征,对其中存在的“文本缺陷”进行界定与类型划分,具体将其归纳为显性缺陷、隐性缺陷与非典型性缺陷三类。在此研究基础上,以韦利(Arthur Waley)与梅维恒(Victor H. Mair)两位学者的英译文本为研究语料,通过对比分析,系统梳理并提炼出二者在应对变文文本缺陷时所采用的三类核心补缺策略,即叙事性补缺、逻辑性补缺与文化性补缺,并结合具体译例阐释不同补缺策略背后所蕴含的译者翻译理念与跨文化传播考量。

关键词:敦煌变文;文本缺陷;翻译补缺;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3-0132-11

DOI:10. 26922/j. cnki. waiguoyuwen. 2026. 03. 011

0 引言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诸多遗书的发现“震动了世界学坛,从此产生了一门国际性的综合学术——敦煌学”(项楚,2019:1)。在所有敦煌出土文献中,对民间文学研究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被称作‘变文’的、最具代表性的材料”(Mair, 1989: 6)。中外学者都认同“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文学样式,变文在文学史上是关键一环”(陆永峰,2000:330)。一些学者“甚至以其为近千年来中国俗文学的根”(罗宗涛,2021:7)。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敦煌变文从面世伊始就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变文”这一概念在学界尚存争议。本文采纳王重民等编纂的《敦煌变文集》所采用的广义用法,且所引译例原文均出自该文献。

基金项目:广东省“十四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敦煌变文英译研究”(GD22CWY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颜方明,男,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学经典翻译研究。

秦倩,女,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引用格式:颜方明,秦倩. 敦煌变文英译补缺现象研究[J]. 外国语文,2026(3):132-142.



本刊微信公众号

随着国际敦煌学的发展,一些汉学家也开始向西方译介变文。韦利(Waley, 1960)和梅维恒(Mair, 1983)先后甄选了部分变文英译并推介给西方读者。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都关注到了大部分变文存在不同程度的“文本缺陷”现象并采取了相应补缺策略。这些变文的“文本缺陷”既有保存不善或传抄不完整而导致的部分内容缺失,也包括了变文作为古代口头文学内在的“文本缺陷”。富世平(2007)认为,变文演绎者的不细致导致变文“出现一些在细节方面与说唱的整个故事前后不太一致之处,或者有一些前后表达在语意上不太一致的地方造成所谓文本的缺陷。这在作家作品中是很少见到的情况”。朝戈金(1999)也认为,这类文本缺陷“是口头表演中所难以避免的”。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变文的“文本缺陷”特征及其在英译过程中引发的补缺现象展开系统探讨。因此,本文拟以韦利和梅维恒的敦煌变文英译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补缺策略的归纳与分析,揭示该类文献在跨文化翻译传播中的补缺机制及背后的译者行为动机。

1 敦煌变文“文本缺陷”分类

包括变文在内的敦煌遗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许多抄本被损坏了”(Schmid, 2001: 964)。这也是一些变文语篇存在缺陷的原因之一。《敦煌变文集》是“根据一百八十七个写本,过滤之后,经过互校,编选了七十八种,计分正文八卷,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计。在争取保存原貌的要求下,力求读者批阅的便利。对于研究者的资料供应,本书应该是被认为是从来变文辑本中最丰富的一部”(王重民等, 1957: 出版说明)。尽管《敦煌变文集》选编经过精心挑选,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变文历经风霜、留存面世的不易。编者们“凡缺字、误字、别字及不易认识的字均依原样迳录”(王重民等, 1957: 叙例),“底本缺字用口表之,缺几字用几□。若不能确定所缺字数,则用□□表之,而在校记内注明缺若干字。”(王重民等, 1957: 叙例)。对于这些存在不同程度缺陷的文本,译者在翻译过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处理因保存或传抄等原因所致的文本缺陷。其次,由于变文是口语,而抄写变文的人所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变文在传播、保存及发掘的过程中即便保存完整,也会存在一些的叙事及逻辑缺陷。如《伍子胥变文》中描写伍子胥逃亡途中,行至颍水之滨时,文中有一段叙事散文:“女子泊沙,拍纱于水,举头忽见一人行步璋狂,精神恍惚,面带饥色,腰剑而行。知是子胥,乃怀悲曰……”(王重民等, 1957: 5)对一个与伍子胥素未谋面的女子来说,在见面瞬间如何“知是子胥”缺乏叙事逻辑的过渡,因而显得十分突兀,明显呈现叙述上的逻辑跳跃。另外变文还有一段有关浣纱女的心理描写:“倘若在后被追收,必道女子相带累。三十不与丈夫言,与母同居住邻里。娇爱容光在目前,列(烈)女忠贞浪虚弃。”

(王重民等, 1957:7)这段话后面还有一段浣纱女的自我介绍:“儿家本住南阳县,二八容光如皎练。泊沙(拍纱)潭下照红妆,水上荷花不如面。”(王重民等, 1957:5-6)这两段文字分别用“娇爱容光”和“二八容光”描写了浣纱女的美貌形象。中国古代常用“二八容光”指16岁左右青春少女的美貌。但是前面的心理描写中“三十不与丈夫言”所述“三十”的年龄与容貌描写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女子30岁,哪怕在现代也应归属于大龄范畴。就生活条件而言,浣纱女生活的颍水之滨应属于人迹较少的穷乡僻壤,30岁的年纪在现代社会或许能保持“徐娘半老”,但在伍子胥时代能否保持“二八容光”则明显存疑。这一叙述显然是原文叙述逻辑上存在的缺陷。

关于“文本缺陷”的既有研究,如富世平(2007)与朝戈金(1999),主要聚焦于文本内部逻辑不一致现象。莱斯(Reiss, 2000: 64)则从文本类型理论出发,将其纳入“内容错误与风格缺陷”范畴予以区分。本文在文本细读与归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敦煌变文的文本特性,提出“文本缺陷”三分框架,即显性缺陷、隐性缺陷与非典型性缺陷。三类缺陷的具体内涵与判定标准如下:显性缺陷指文本在保存与流传过程中形成的、无需复杂认知加工即可直接识别的缺陷,核心判定标准为“直观可感性”。这类缺陷多表现为文本残缺或讹误等一目了然的问题,是变文中最易被发现的“硬伤”性质缺陷,其存在不依赖读者的专业背景或深度推理,仅凭文本表面形态即可判定。隐性缺陷特指需读者投入较多认知努力,通过文本内部逻辑梳理、语境关联分析或跨文本比对才能发现的缺陷,核心判定标准为“逻辑关联性”。这类缺陷主要体现为文本叙事逻辑断裂、语义矛盾、指代模糊等问题,同样属于“硬伤”性质缺陷,但由于其隐蔽性较强,需依托文本内在逻辑关系的推导才能识别,对读者的文本解读能力有一定要求。非典型性缺陷是区别于前两类客观性缺陷的特殊类型,属于“非严格意义的文本缺陷”。这类现象在字面表达与基本叙事层面无明显问题,仅当读者具备特定文化背景或专业知识时,才会发现其文化信息传递的不完整性或准确性偏差。例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并序》结尾句:“当时(持)此经时,有八万菩萨、八万僧、八万优婆塞、八万[优婆]姨,作礼围绕,欢喜信受奉行。”(王重民等, 1957:744)对于仅关注故事情节的普通读者而言,该表述无明显瑕疵;但熟谙佛教文化的读者可知,文中“八万”并非精确数字,而是佛教文化中“八万四千”这一数字符号的简化形式。后者在佛教经典中常用以象征数量极多,如“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烦恼”这类表达常见于各类佛教经典中。此类“文本缺陷”对文本核心意义的传递影响有限,仅在文化信息精准传递的维度上存在“不足之处”,故归为非典型性缺陷。现有研究中,莱斯等学者对“文本缺陷”的分析仅聚焦于狭义的文本缺陷,即本文所涉的隐性缺陷,未关注其他两类。本文

基于广义文本缺陷的研究视角,构建“显性—隐性—非典型性”分类框架。后文将以此分类为基础,详细阐释韦利与梅维恒在变文翻译中针对各类缺陷采取的补缺策略,并从文本完整性、可读性与文化信息传递准确性三个维度,对其补缺效果予以评析。

2 叙事性翻译补缺

造成文本显性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是因文本保存不善和考古挖掘、搬运所致;二是因传抄错误或传抄不完整所致。斯坦因(Aurel Stein)和伯希和(Paul Pelliot)曾谈到初见敦煌遗书石室的印象,认为“这些抄本被储存于此的时候原本就是非常仓促的,王道士对大部分抄本保持原封不动”(Mair, 1989:5)。这些遗书包括了正式的官方文书、佛经,以及“题记、契约、低级官员的记录、社司转帖、有关寺院管理的记录、经录、经典的和民间的文学的抄本、识字课本、占梦手册,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文书”(Mair, 1989:6)。其中既有比较完整保存的文献,也有很多属于文件碎片,“留存了五世纪到十一世纪这个时间段的三万至四万件抄本及残篇”(Schmid, 2001:964)。如《伍子胥变文》开篇句:“昔周国欲末,六雄竞起,八口诤(争)侵。”这一句中的符号“口”代表的是文本此处缺损。本篇变文结尾处句为:“联梦见忠臣伍子胥言,越将兵来(下阙)。”这里的“下阙”标记的是后面的内容缺失。这种文本缺陷是变文中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孟姜女变文》的开篇和结尾处都分别有“前缺”和“下缺”标记,《王昭君变文》开篇也有“前缺”标记等,不一而足。

这些敦煌变文中,很多“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传抄过来的,被商人或朝圣的佛教徒带到敦煌并捐赠出来的”(Mair, 1989:965)。抄写人的身份不一,包括僧人、佛教俗家信徒、世俗学生和俗家讲唱者。僧人抄写者中有部分是为学习佛法和练习书法,也有部分是比较专业的讲唱人,总体上相对其他人要更专业化。很多佛教俗家信徒则是“为了积德,这些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虔诚信徒委托他人誊抄并捐赠了很多佛经”(Mair, 1989:966),这说明了为什么有些敦煌出土的佛经有多部并存的现象。世俗学生抄写佛经变文或历史变文则常常出于提高文化水平和练习书法的目的,“一些抄本表现出较大的变异性,包括词汇层次的变异和风格、形式甚至文类的变异。这些变异不仅反映了个体的抄写能力,也反映了这其中大部分文本的非正统、民间属性”(Mair, 1989:967-968)。俗家讲唱者因其表演需要,也常成为抄写变文的重要群体。这些抄写者教育水平不一,在传抄过程中常出现讹误而导致文本缺陷。试对比分析下面两例原文和译文:

例1 昔周国欲末,六雄竞起,八口诤(争)侵。(王重民等,1957:1)

梅译: Of old, when the Chou Dynasty was on its last legs, the six braves began to contest

among themselves and the eight barbaria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invading the realm. (Mair, 1983: 123)

例2 吴王夜梦见忠臣伍子胥一言曰:“越将兵来伐,王可思之。”□平章:朕梦见忠臣伍子胥言,越将兵来“朕梦见忠臣伍子胥言,越将兵来(下阙)”(王重民等,1957:28)

梅译: That night, the King of Wu saw in a dream the loyal minister, Wu Tzu-hsü, who spoke a word with him: “Yüeh is leading troops to come in attack. King, you may well ponder it.” The King of Wu at once sent for his hundred ministers and took counsel with them: “I saw in a dream the loyal minister, Wu Tzu-hsü, who spoke to me these words: ‘Yüeh is leading troops to come in attack. King, you may well ponder it.’” (Mair, 1983: 165)

韦译: (Yüeh destroyed Wu in 473 B. C., twelve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Wu Tzu-hsü. The Ms goes on for another fifteen lines or so, telling of events after Wu Tzu-hsü's death, and then, after becoming fragmentary, breaks off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I have thought it best to stop at Wu Tzu-hsü's death.) (Waley, 1960: 52)

(注:由于韦利采取节译策略,例1没有韦利译本的对应译文,例2韦利未直接翻译,仅在内容缺失处进行了注释。)

《伍子胥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篇幅较长且保存相对完整的叙事作品,先后由韦利与梅维恒译为英文。由于韦利采取节译策略,例1中的内容未在其译本中出现。而梅维恒在翻译该句时,对原文缺失内容进行了补全,将“口”译为“barbarians(夷人)”,整句回译成中文为“昔周国欲末,六雄竞起,八夷争侵”。结合上下文来看,这种补缺处理合乎叙事连贯性。例2同样未出现于韦利译本中,但他在译文末尾以括号加注的方式,交代了故事结尾的缺损情况并说明了自己的节译考量:“伍子胥死后的叙述部分缺失,末句仅存半句,我认为宜在伍子胥身故处收尾。”梅维恒则仍采用文中补缺的策略,在结尾处增补了两处内容,即“The King of Wu at once sent for his hundred ministers and took counsel with them(吴王便即遣百官平章)”及“in attacking King, you may well ponder it.(王可思之)”。从语境推断,梅维恒的补缺内容与篇章的叙事契合度较高。就忠实度而言,梅译更贴近原文结构,所补充的内容亦顺应叙事脉络。而从篇章完整性来看,韦译通过节译并辅以注释,依托历史背景对故事结尾作了补充说明;梅译在正文叙述上似乎戛然而止,并未对结尾进行大幅增补,但他在译本附录中进行了说明,指出“原文虽断于此,却也不失为一种可接受的结尾方式”(Mair, 1983:304)。总体而言,韦利与梅维恒均基于自身判断,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对文本缺损处进行适当的叙事性补缺处理。韦利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采取节译策略,删繁就

简,以服务叙事连贯,并以文内注释策略进行补缺;梅维恒的主体性则表现为依据上下文谨慎补全内容,以贯彻其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与此同时,梅维恒还以尾注方式对自己的补缺策略进行解释,凸显了翻译在连接残缺文本与完整理解之间的中介功能与阐释价值。

3 逻辑性翻译补缺

除上述一目了然的显性文本缺陷外,敦煌变文中还存在一些需要仔细推敲才能发现的隐性文本缺陷。这些隐性文本缺陷主要表现为逻辑上的不完美。造成隐性文本缺陷的原因与变文作为口头文学的身份和说唱表演性质有密切关系。变文文本与早期“平话”一样,主要是供演出所用。“今存敦煌变文绝大部分都是演出时的实用文本,它们大多具有口头文学的特点,所以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与书面文学迥异的特征。”(李小荣,2013: 351)在叙述方式上,变文也具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特征,文本中的叙述者常以说书人身份出场。与现代叙事文类比较,变文“情节都比较简单,全靠说话人加以敷衍,因而仅能是说书人的重要参考书”(王平,2001: 39)。变文不像一些正式场合的讲史、说经,“受到某些历史的或宗教的规定性制约”(董上德,2007: 271)。变文作为说唱表演脚本,在不同演绎场所“可以根据需要,将部分描写或省略、或补充、或改写,极富弹性”(荒见泰史,2010: 导言)。说唱表演者“在有所依傍的前提下自行在固有的故事框架之内编造情节、补充细节”(董上德,2007: 271)。这一点是变文作为口头文学与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点,也是敦煌变文同一题材常有多版本的重要原因。“在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这种现象:即某一个文学作品,由作者以外的第三者来修改,或者被改写成为不同的作品。但是在口承文学、讲唱文学等以口头演绎为载体的作品里,这种现象并不足为奇。”(荒见泰史,2010: 3)由于表演的需要,在具体的场合中表演者需要采取灵活策略,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听众做出适当的调整。随着时代的发展,表演者的身份也多样化,既有教育程度较高的僧人、专业艺人,也有市井讲唱者,变文的抄录者相应也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人士。敦煌出土的变文应该源自不同阶层的抄录者之手,因此一些变文呈现程度不一的隐性逻辑缺陷。我们不妨看看下面例子:

例3 会昌既临朝之日,不有三宝,毁拆迦蓝,感得海内僧尼,尽总还俗回避。(王重民等,1957:196)

韦译: When the Hui-ch'ang Emperor came to the throne there was no more religion in the land. The monasteries were destroyed and all the monks and nuns within the Four Seas were obliged to return to lay life and go into hiding. (Waley, 1960: 74)

例4 “……三十不与丈夫言,与母同居住邻里,娇爱容光在目前,列(烈)女忠贞浪虚弃。”(王重民等,1957:7)

梅译:“Thirty years old, never before having talked to a man”,

I live together with my mother in our neighbourhood.

The graceful, charming glow of the face you see before you,

The faith and chasteness of a virtuous woman—all cast away in vain. (Mair, 1983: 130)

韦译: At the age of thirty I have never before talked with a grown man;

All the time I have stayed in my village living in my mother's house...

A face aglow with graceful charm, as you can see for yourself,

A virtuous woman, chaste and true, is cast away in vain. (Waley, 1960: 31)

(注:例3选自《韩擒虎话本》,该文本仅有韦利译本。)

在例3中,“会昌”为唐武宗年号,原文显然将其灭佛事件与梁武帝混淆,且与后文隋文帝杨坚夺位的时序矛盾,构成历史逻辑硬伤。这一文本缺陷对一般读者而言较为隐蔽。韦利未在正文中直接修正,而是在附录中注释说明:“会昌帝在位时间为公元841-846年。作者将会昌帝843-845年期间的毁佛与574-576年间的毁佛混为一谈。”(Waley, 1960: 255)这一做法属于副文本层次的逻辑补缺,在功能上表现为文本的“表层叙述”与“深层阐释”:既保持了原文的叙事流畅与历史原貌,又通过注释补全历史语境,使翻译同时承担信息传递与文本批评的辅助功能。韦利的处理显示其兼顾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的需求:在维持叙事连贯的同时,为学术研究提供考辨依据,体现了翻译面向不同读者群体的差异化功能。

例4为“浣纱女”的韵文唱词,表面无明显缺陷,但隐含两处逻辑矛盾:30岁是否仍具“娇爱容光”,以及投河是否确属必要。韦利与梅维恒均保留“三十”未改。韦利在文内加注指出:“此句与随后三句在衔接上有所不足。据儒家上流社会流传的故事版本(《吴越春秋》),该女子与母亲依礼共居至三十岁,而今向陌生男子赠食之举违背礼制,成为其无法承受之过。而在十四世纪早期杂剧《伍子吹箫》中,这一儒家主题被舍弃,改为女子为使伍子胥安心前行、不必担忧其向楚廷告发而选择自尽。”(Waley, 1960: 31)其注释不仅揭示文本表层的逻辑间隙,更通过引入不同版本,呈现叙事传统与伦理观念的演变,拓展了读者对人物动机与文化背景的理解。梅维恒则在附录中说明:文中两次提及该女子“与母亲共处三十年”,因而“虽其容貌被描述为‘二八容光’,亦不宜将‘三十’改为‘二十’”(Mair, 1983: 271)。译者在副文本中的逻辑补缺凸显了对原文本的尊重,其注释旨在阐明译者立

场和译本的文本依据,从而增强译文的学术客观性。两位译者均未改动原文,而是通过注释提示逻辑问题,引导读者辨析。这种做法将翻译变成一种伴随译者阐释的阅读引导活动。

4 文化性翻译补缺

敦煌变文在文类上属于口头讲唱文学。讲唱表演与讲经和唱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都是佛教经典通俗化的常用手段,并且僧人对它们常常是各有专攻”(李小荣,2013: 107)。初期表演讲经和唱导僧人要求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专业知识和表演能力。变文“经过长期的演变和陶镕,统治我民间文学达千年之久……变文的体裁是以诗歌与散文合组而成,与俗文相似;但变文之主旨,则在敷陈故事。故事内容,则多采取佛经或中国原有之故事,重加敷衍;使变为通俗而生动,故曰‘变文’”(李小荣,2013: 42)。变文在讲唱、敷陈的过程中总体上向着完备、丰富、生动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循着雅俗共赏的方向发展,“敦煌叙事文的读者/听众常来自高阶层的世俗和宗教权贵,但也没有将低阶层读者排除在外”(Idema, 2010)。对变文的文学水平,伊维德(Idema)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很多变文即便不是当时最好的学者所撰写的,也显示出了非常高的学养和天赋。这种情形就像中世纪使用拉丁语的英国神职人员不把乔叟当作学者一样。”(Idema, 2010)变文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已经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发展为较成熟的文类。敦煌出土的变文总体上都表现了较好的写作水平,无论篇章叙事还是修辞层面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技巧。当然,以当代小说创作技巧来衡量,这些变文在整体叙事和修辞层面存在不够完美的地方。这类不完美的瑕疵相比第一类显性文本缺陷和第二类隐性文本缺陷,属于非典型性缺陷。试举例如下:

例5 当时(持)此经时,有八万菩萨、八万僧、八万优婆塞、八万[优婆]姨,作礼围绕,欢喜信受奉行。(王重民等,1957:744)

梅译:At the time (the time this sūtra was preached) there were 84,000 Bodhisattvas, 84,000 monks, 84,000 laymen, and 84,000 laywomen, all circling around the Buddha and making obeisance to him. They rejoiced in the receptivity and obedience of their faith. (Mair, 1983: 121)

韦译:The stanzas that Buddha uttered after his Enlightenment led to the conversation of Kaundinya and his four companions. That was the time when this Avalambana Sūtra was preached. Eighty thousand Bodhisattvas, eighty thousand monks, eighty thousand male lay disciples and eighty thousand women lay disciples paraded round the Buddha, doing homage to

him, joyfully accepting his teaching and obeying it. (Waley, 1960: 234)

例6 锡杖敲门三五下,胸前不觉泪湓湓。(王重民等,1957:717)

梅译:With his metal-ringed staff, he knocked at the gate three or four times,

Unaware of the tears which were crisscrossing his breast. (Mair, 1983: 91)

韦译:With his monk's staff he knocked on the gate three times or five,

Scarcely conscious that down his breast the tears were flowing fast. (Waley, 1960: 218)

例5与例6均选自《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在例5中反复出现四次“八万”,梅维恒均译为“84 000”;例6中的“锡杖”则被他译为“metal-ringed staff(镶有金属环的手杖)”。数字“八万”源于佛教文化中象征无量之数的“八万四千”,梅维恒以佛典常用表述“84 000”进行替换,“改变了译文的语场特点,提升了此处的宗教专业度”(桑仲刚,2022)。例6中对“锡杖”的改译同样具有宗教文化理据。锡杖(梵文 khakkara),“又称‘声杖’‘智杖’‘德杖’或‘鸣杖’,为比丘十八物之一,是僧人行走时所持的器具”(陈耳东等,2005:275)。如今锡杖作为法器,主要在佛事法会(如住持升座、传戒法会等)中发挥其仪式功能。其形制多呈塔婆状,以锡、铁等金属制成,杖首附有大环,环下常悬数个小环。就叙事完整性与逻辑性而言,这两处原文难以被视为文本缺陷。梅维恒基于宗教文化知识,分别对“八万”与“锡杖”进行了细节上的矫正与补充,体现了译者的个人理念。例5属于对数字的宗教文化矫正性补缺,例6则属于依据宗教器物文化对文学细节的充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梅维恒对这类非典型“缺陷”的文化性补缺,属于译者与原作者竞赛性的“改写与操控”(Bassnett et al., 1990),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译者相关文化知识的专业度。对于绝大部分译者而言,这类非典型性“缺陷”并非必须补全的文本问题,梅维恒的选择突显了翻译补缺行为可超越单纯的信息补充,上升为文化定位与文本再语境化的行为范畴。译者通过翻译补缺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积极介入,不仅完成语言转换,更承担起文化阐释与语境重建的角色。

5 结语

关于翻译中如何处理“文本缺陷”,莱斯指出,译者应基于文本类型采取相应策略。她认为:“在内容导向型文本的翻译中,修正明显的内容错误与弥补文体缺陷具有合理性。”(Reiss, 2000: 64-65)敦煌变文作为兼具历史文献属性与口头文学特征的复合型文本,其内在的“文本缺陷”为翻译工作带来了挑战。韦利与梅维恒的翻译补缺策略同中有异。其共性源于补缺机制的内在逻辑,而差异则不仅源于个体翻译理念的分歧,更受到历史语境、

学术传统与翻译意图对译者主体性的共同制约。

韦利的译介活动处于 20 世纪下半叶早期,当时西方学界的敦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翻译目的侧重于面向普通读者与文学界的接受效果。因此,他采取的补缺策略(如选择性节译、内容补全与背景注释)旨在缓解文本的异质性与叙事断裂,构建符合英语世界阅读期待的连贯叙述。这一取向受当时大众出版的市场逻辑与读者接受规范的制约。与之相对,梅维恒的翻译实践展开于 20 世纪后期,此时国际敦煌学已趋于专业化,跨学科研究方法也逐渐兴起。梅维恒的学术背景融合了文献考据、宗教研究与口头传统考察,因而其补缺方法(如文本结构补全与宗教术语的校正)更偏重文本的学术准确性,以回应专业读者对“文化传真”的诉求。这一路径受到 20 世纪后期学术翻译规范的影响,强调译文应基于文献依据,并能够参与学术对话。若将二者的实践置于翻译的“求真—务实”连续统中加以审视,则可见梅维恒更倾向于以学术批判的姿态追求文本之“真”,而韦利则更注重以读者为导向达成传播之“实”。二者的补缺实践共同表明,翻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一种融合历史与学术语境、贯穿着译者主体意识的诠释性重构,体现出翻译过程中“跨文化适应的考量”(黄勤等,2025)。这种重构本质上是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学科话语体系之间协商的结果。

因此,对敦煌变文英译中补缺现象的评价,不应局限于译文本身的“正确性”或“恰当性”,而应将其置于相应的历史条件与知识体制之中,剖析其背后的规范约束与文化操控机制。未来研究可拓展至不同时期、不同学术背景的译者,系统考察翻译规范如何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影响文本的重构方式,从而深化我们对同类文学典籍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涉及权力、知识与再现机制的理解。

参考文献:

- 朝戈金. 1999. 口传史诗的田野作业问题——南斯拉夫和蒙古史诗田野作业评述[J]. 民间文学研究 (3): 39-43.
- 陈耳东,陈笑呐,陈英呐. 2005. 佛教文化的关键词[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董上德. 2007. 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富世平. 2007. 敦煌变文程式化创编所带来的文本缺陷问题[J]. 文学遗产 (6): 54-60.
- 荒见泰史. 2010. 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 黄勤,何霜. 2025. 方志彤英译《资治通鉴》之译者行为探析[J]. 外国语文 (2): 114-124.
- 李小荣. 2013. 敦煌变文[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 陆永峰. 2000. 敦煌变文研究[M]. 成都:巴蜀书局.
- 罗宗涛. 2021. 敦煌变文:石窟里的老传说[M]. 北京:九州出版社.

- 桑仲刚. 2022. 敦煌叙事文献《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英译的描写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92-99.
- 项楚. 2019. 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平. 2001.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 王重民, 王庆菽, 向达, 等. 1957. 敦煌变文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Bassn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1992. General Editors' Preface[G]//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Idema, Wilt. 2010. Dunhuang Narratives[C]//Kang-i Sun Chang &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3-380.
- Mair, Victor H. 1983. *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ir, Victor H. 1989.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M].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eiss, Katharina. 2000.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chmid, Neil. 2001. Tun-Huang Literature[G]//Victor H. Mair.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64-988.
- Waley, Arthur. 1960. *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On the Phenomenon of Translational Rectific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Dunhuang Bianwen”

YAN Fangming QIN Qian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Dunhuang Bianwen” holds unique literary and cultural value. Taking the phenomenon of textual rectific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unhuang Bianwen” as its focal point,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First, based on the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f “Bianwen”, we define and categorize the “textual defects”, classifying them into three types: explicit defects, implicit defects, and atypical defects. Grounded in this framework, we utiliz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scholars Arthur Waley and Victor H. Mair as our corpu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and outline three core rectific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se translators to address textual defects in Bianwen: narrative rectification, logical rectification, and cultural rectification. By analyzing specific translation examples, we further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and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s that inform these rectific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Dunhuang Bianwen”; text defect; translational rectificati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 陈宁